

决策参考

Jue ce can kao

第 139 期 (总第 389 期)

盐城市图书馆编

2012 年 12 月 31 日

主编 刘进 责编 周玉奇

zhouyuqi@gmail.com 18961988622

编者按：2012 年全球经济，由表及里，“傲慢与偏见”构成了 2012 年经济精神的核心关键词，它最终使得 2012 年全球经济在普遍失速的下行通道中呈现出令人无奈的趋势特征。

回眸 2012，这一年是全球领导人的换届之年。新人当政，新风扑面，给人希望和信心。2012 年的最后一个月，距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履新刚 40 天，高层领导在主流媒体即率先披露个人工作、生活、家庭信息，其中对配偶、子女等信息的集中披露属首次，更具震撼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新的突破。这也许就是专家的评论，中共高层家事披露正在为官员财产公开作探索。

展望 2013，后十八大的中国，进入“习李新政”时期。尽管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总体发展良好，取得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但全球金融危机也改变了中国的外部环境，不仅出口减速，而且面临巨大压力；此外，经济结构调整缓慢，高投资低消费、工业增速快于服务业、部分行业存在“国进民退”、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急需解决。

2012 年 11 月 30 日，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座谈会上向专家们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位外国人一百多年前写的书何以值得推荐？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启发？朱学勤先生对法国大革命素有研究，本期刊发他就此主题所做的长篇演讲，供各位领导参考。

2013，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等待改变，我们心存希望，我们一直走在大路上。

要目

●本期专题/回顾与展望

中国经济 2012 年回顾与 2013 年展望

全球经济 2012 年回顾与 2013 年展望

未来 15 年中国政经走向预测

未来 20 年两大权力转移

●国是论衡

2013，习李新政突破口何在

中共高层家事披露为官员财产公开作探索

●他山之石/ 美国是如何抑制住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

●悦读时光/ 出家、思凡、大还俗——朱学勤谈《旧制度与大革命》

●本期专题/回顾与展望

中国经济 2012 年回顾与 2013 年展望

中国财经年会 2013：“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中国经济 2012 年回顾与 2013 年展望讨论实录如下：

主持人：掌声有请主持嘉宾财经杂志主编何刚先生。

何刚：各位嘉宾大家好。就像芝加哥大学几位教授展望的，2013 年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同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他们也充满了期待，也给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这节我们将集中讨论总结 2012 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同时对 2013 年中国经济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中国今年面临的形式是外需明显不振，内需也存在是否能够真正崛起，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调整，中国经济的增速明显有所下降；另外对于下一步中国经济如何持续保持增长，同时进行深层次的调整，在中国也有很多的争议，包括是否要启动新一轮的货币政策，针对这些问题，各方面有很多的看法和分歧。但是接近年底，结合全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一些共识也在逐渐形成。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五位重要的嘉宾，他们分别来自于我们政府的决策部门，研究部门和金融机构的研究部门，他们分别是：

第一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陈东琪先生。

国务院参议室的姚景源先生。

中国银行地域学家曹远征先生。

摩根斯坦利的董事总经理乔虹女士。

最后一位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副主席哈继铭。

首先我们分别有请 5 位嘉宾，每位严格限定 5 分钟之内，核心阐述一下他们对 2012 年中国经济的总结，尤其对 2013 年中国经济的展望。我们会有几个问题进行讨论。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代问的，通过纸条或者其他方式告诉我。

首先我们有请陈东琪院长阐述他对中国今年经济的总结，和明年的展望。

陈东琪：今年不容易，中国经济在外部环境偏紧的情况下，应该会实现年初预期的 7.5%，或者略高一点的增长速度。一、二、三季度是下降的，从各方面的指标来看，四季度可能略有回升，预计会在 7.8 左右。全年 GDP 增长比去年减速，但是能够达到 7.6, 7.7 左右的水平。

这主要得益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今年国内的消费保持在 13、14 的增长，也主要因为汽车进入家庭，住房方面的消费，旅游，医疗等，消费结构升级带来我们的消费需求保持了增长。

另一方面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推动的增长，还是做出了贡献。当然最近的几个月出口有所复苏，在 6 月以前是下降的，7 月以后触底回升，说明外部环境出现分化，欧、日是下降，对我们的出口影响很大。美国最近两个季度需求有所增加，对中国的出口有所增加。

所以总体来讲今年在全球的公共需求收缩，结构调整在加快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实现 7.5% 以上的增长，不容易，我感觉是不容易。

明年总体来讲还可以看上一点，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等外部环境，估计躲过财政悬崖以后预期还可以。欧洲，日本可能还会有连续的衰退，但是下半年预期会好一点，这是我们的外部环境虽然还是紧，但是会比今年前三季度要好一点。

主要是明年国内前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有所放松，会产生滞后的积累效应。

第二，中西部地区发展还是比较大。

第三，消费推动投资增长，我们认为还是有比较好的预期，主要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农村还应该有两位数，城镇还会有 9% 左右。总体来讲预期还是不错。

所以明年的经济预期会比今年略好一点，但是存在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美国的财政悬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可能对经济影响的深化，以及日本经济持续的衰退甚至低迷对我们的影响，明年可能会困难一点。所以对我们预期向好不能太乐观。

另一方面现在企业还比较困难，有一些企业开始裁员了，这对我们劳动者收入预期，要保持今年的增长有一定的难度。

还有这次经济触底，回稳更多靠市场调节，政府政策与 08、09 年相比，力度一定会减小，这当然会对复苏、回升，产生一定的延期影响，就是没那么快。所以明年的经济总体来讲谨慎、乐观或者偏乐观，但是有风险。全球的经济，中国的经济，不能太乐观，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何刚：陈院长言简意赅，把今年的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情况做了很好的总结。尤其其他提到消费的增长是在明显的上升，而且在明年消费增长带来的反推投资增长是预期的，但是提醒我们外部的风险和内部企业的裁员带给我们的麻烦和影响。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位嘉宾，姚景源姚先生，进一步阐述对中国今年经济的总结和预期。有请姚先生。

姚景源：我完全赞成刚才陈东琪讲的对今年经济的判断和明年的预测。

中国经济，我们在去年工作会议的时候，我们确定今年两大任务，一个是稳增长，一个是稳物价，稳增长定的目标是 7.5%，稳物价我们把物价上涨定在 4%，现在我们这一年即将过去，增长东琪对中国经济今年增长做了一个预期，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经济今年经济可以实现 7.5% 以上这样一个预期目标，7.5 以上这个增长目标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经济从去年第一季度开始，我们连续 7 个季度下行，而外部环境，整个世界经济又是一个复苏缓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经济能够实现 7.5% 以上的增长来之不易，这是第一。

第二，物价也是这样，我们这几年全社会普及率最高的词汇就是 CPI，每个人都在关心 CPI，我们把稳物价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我们物价上涨率控制在 4% 以内，这是毫无问题，这也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成就。

我们现在可以讲，说今年就是我们的两大任务，稳增长，稳物价我们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是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今年的问题，我们即使是实现了 7.5 以上的增长目标，但是应该讲我们在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还亟待提高，因为我们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我们到 10 月份才刚刚由负转正，如果我们要盘查今年，7.5 目标实现这是成绩，问题是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还亟待提高，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增长方式和结构调整还没有实质性的大的根本性的进步，我觉得这两条应该都是大问题。

如果讲到明年经济，我也赞成陈东琪同志的意见，对于明年的经济，我们还是要在今年稳中求进的基础上，明年中国经济应该为改革能够留出更大的空间，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放到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上。十八大之后，我们新一届政府，大家希望有更大更深层次的改革来推动，从这种状况看，我们要为改革留下空间，为增长方

式和结构调整能够出现大的进步创造条件，为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奠定基础的话，我主张我们明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不要过快。

大家知道，我们不少人对明年的中国经济有很多的预测，我觉得有的指标是过于乐观，明年我们还是要看到我们中国经济，我们还是面临着诸多的矛盾，诸多的挑战，诸多的深层次问题。而且我觉得我们也没必要把明年整个经济增长目标追求过高的速度。所以明年我们还是主张更多的应该为我们的改革留下更好的空间。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

何刚：姚老师的数字首先从稳增长和稳物价两个数字上来阐述他的总结。显然他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质量和效益还是难提，另外改革要预留空间，速度确实不要过高，但是改什么，怎么改，接下来我们讨论当中还会继续深化。

第三我们有请中国银行的首席金融学家曹远征先生。

曹远征：谢谢，中国经济经过 7 个季度的下滑以后，我们认为会好转。经济增长的速度维持在 7.7% 左右。

从明年来看，明年情况会更好一点，大概速度能够在 8%，稍微强一些。

之所以有这个判断，是基于短期宏观经济的。我说明一下中国经济正在面临一个转折，连续 7 个季度的下滑，不仅仅是意味着宏观周期的波动，很可能是结构性的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在发生变化，第一，世界经济在未来中间并不是很乐观的，中国经济的出口导向型这种模式显然是难以持续的。

第二，中国劳动力成本在持续上升，使过去低成本制造业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维持。

第三，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投资驱动型经济也会走到尽头。

第四，资源的约束，环境的约束也在日益加强，也要求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

正是由于结构性因素朝区域性因素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下行。和过去 30 年相比，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中国经济这个转折在告别两位数的增长阶段，转向较高速的，比如说 8% 这样的增长。

我们注意到，像城镇化尚为完成，如果要经济稳定增长，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安排，大家都提到了，改革是很重要的，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使经济增长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才不至于大起大落。

经济增长最大的风险，未来希望是靠消费带动，前景是光明的，问题是消费的发动机，发动还需要一段时间，出口的发动机正在减速，经济还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问题投资也是至关重要的。

从明年情况来看，我们认为是一个转折时期，经济不能从公关周期性波动来考虑问题，还有从结构转变的问题加以考虑，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经济有一个明显的认识。以上是我的发言，谢谢。

何刚：曹先生参与 80 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讨论，决策咨询，所以他对中国经济目前的速度放缓做了更加有历史纵深的分析。

对接下来的经济增长，他提到了一个看法，他更强调稳投资，因为出口指望不上，消费不会大幅增加，只有保持 7.5 到 8 的速度，稳投资非常重要。待会儿我们话题会进一步讨论中国经济持续的动能。

接下来我们请第四位嘉宾乔虹做进一步的讨论。有请。

乔虹：谢谢大家。首先赞成一下陈总和姚总的观点，现在到了现在的水平上。所以在这个时候，无论从政策面，还是从学界，以及我们商业机构，越来越关注的是中国从结构上是不是要面临经济潜在的经济增速放缓的过程。

因此我们再次反省，是不是要进行更多的再平衡。这个词是最近讲得最多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这可能也是最难的一点。我们看到今年特别是这样一个典型。

曹老师已经讲了 2012 年看到的难题，在改革和重新分配资源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很难达到既要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要进行资源再分配，重新再平衡的一个中间的制衡，我们看到似乎 2012 年实现并不是特别多的刺激消费，而是更大程度地投资，经济下降也是非常明显的。

今年我们马上进入 12 月，进行一个整体的回顾和判断，今年既有出乎意料的部分，也有不出乎意料的部分。不出乎意料的部分，就是各位已经讲过的，从外需来看，今年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年，我觉得在去年同样的时间，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也反复强调，不要对于今年的外需，对于 2012 年的外需有太高的期望，恐怕欧洲事件仍未解决，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因素，今年果真如此。

另外就是投资，对于进一步投资的控制，政策缓慢的转向，都使得今年的投资增速不能快速上行的主要问题。

但是今年比较出乎意料的，最出乎意料的事件是存在于今年从政策的反应速度，以及程度上面，可能对于咱们年初制定的想法，在进行对比的时候，会觉得可能是差于预期，尽没有想像的快，力度也没有想像的那么大。

我们谈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在过去 9 个月的时候，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家反复不停地说，经济见底了，这样反复地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是见底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判断政策应该出手了，政策经济变得更强一些。

但是为什么没有？这就联系到第二个出乎意料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向，今年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我们今年 7.5% 的增长目标，我们预测 7.7 左右的水平应该是超额完成任务，但是 7.7 的水平是很艰难才达到的。但是有一个数字，我们今年提前完成任务，是就业，在 9 月份的时候，1100 万的新增就业人口的目标已经完成，这 1100 万的工作机会在 9 月份完成，是在一个我们的增速一直是 7、8 个季度连续下滑的背景之下，我们完成了就业的目标。原来经济学家认为的经济增速下行，我们不但以 8% 的经济增长，如果掉到 7 或者 6 的话，一定会最就业有影响，政策制定者肯定会出台一些方案去救助，这些才能保持社会稳定。

可是从这样一个逻辑，08 年再次印证的逻辑，看到在 2012 年实际上是我们的就业环节，就业环节并没有出现巨大的问题，我们没有看到广泛的裁员，没有出现广泛的问题，在服务业，在中部地区对就业还是有很强需求。

这是我从宏观经济判断上，以及政策分析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总结，劳动力市场是不是已经面临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从劳动需求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在未来五年之内，将无法再用原来的逻辑再进行继续，如果经济增速降到 8 以下，政策一定要出台，否则我们就很难预期劳动力市场能够比较稳定，失业率会大幅提高，这样原来的一种逻辑，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会得到更大的挑战。

在 2013 年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逻辑，最重要的变化，是在短期之中，我们很难判断政策在短期之中要进行非常紧促地进行刺激，如果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相对稳定，增长稍微低一点，是不是政策制定者可以接受，现在来看似乎可以的。

在未来城镇化，政策的出台，可能会伴随一部分政策的放松，我们在短时间内认为政策连续性比较强，大家在 6 到 12 个月的范围内，看到政策稍做放松。

在 2013 年 GDP 的增长可能会恢复到 8.2 左右的水平，这个水平有人说是不是太乐观，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稳重的。这样一个谨慎的预测，主要是有以下几点概括，一个有高有地之中，基数低，但是年同比稍高，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认为在 2013 年会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验证。

第二，如果从内需和外需的角度来看，外需仍然比较低迷，但是内需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恢复，特别是投资会比去年要好一些。

在政策预期方面也是有高有低，预期比较低的一部分，就存在于我们认为在短期之内，不会有银贷一次性大规模进行政策的改变和刺激，在短期之内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不太容易出现的。但是我们对于政策预期比较高的方面，就体现在我们对于结构改革中长期政策的改变，还是有较高的期望。我的发言基本到此为止，谢谢。

何刚：乔虹的分析有新意，提到几个非常重要的异常，政策明显滞后，但是就业形势并没有大家想像的那么严峻，对于明年的经济增长是最乐观的数字，8.2%，这个数字我们有没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待会儿会有追问。她对政策的短期和长期的一次性刺激也提出了看法。

我想接下来我们难题就交到哈博士这里，可能有些看法他是赞同的，但是有些分析的视角要换一下，阐述他对中国经济的总结和预期。有请哈博士。

哈继铭：我不知道会议主持得那么好，还有我的 PPT，其实我只要用一两页就行。

首先谈一下短期对经济的判断，接着谈一下对中长期未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判断。

短期来看，我觉得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进入一个 U 形复苏的轨道，2、3 季度是 U 形的底部，一季度是 U 形的前半段，估计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能够在 7.5 到 8% 这么一个区间，两头高中间低的局势，现在已经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今年我们把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 7.5% 的话，还是显现出政府对于短期内稳定增长还是给予高度的重视，在这么一个前提下，我相信明年经济增长达到 8% 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因为目前来看，我们年终以来出台的调整政策，尤其在财政方面立足的加大，以及项目审批力度的加大，效果还会进一步显现，而且这个判断短期内也无需进一步推出反周期性的刺激政策。

这样的增长如果看得更远一点，是不是可持续，我相信过去中国分析经济大家谈得比较多的三架马车，消费，出口，投资，更严格的说应该是四驾马车，私人部门的消费，投资出口，这三架马车还是比较弱，增长最快是政府的投资和消费在推动眼前经济的上涨。但是长期来看，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接下来我想谈一下中长期的挑战和机遇。为什么改革开放是未来中国最大的红利？过去 30 年，20 年，平均能保持 10% 的经济增长，有两大因素，一个是人口红利，二是改革红利，但是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这就对改革红利提出更高的要求。

如果说过去的增长保持在 10% 是人口红利推动的话，但是过去的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的起落，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到，似乎不能用人口红利来解释，不然的应该是平的。

在 92 年到 98 年，潜在增速是下降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波动？这跟改革开放很有关系。在 90 年代，92、93 年的时候，推动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来自于财政和货币的扩张，其结果导致了短期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带来的后遗症还是通胀，产能过剩。

到了 97、98 年的时候，我们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第一，国企改革，提高的经济增长的效率。第二房地产改革。第三，01 年的时候进入 WTO，既打开了增长空间，也提高的增长效率，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出口行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放到国际上去竞争，提高工作效率。

我们之后的十年，享受了这样一种改革红利，但是到了 07 年的时候，潜在增速见底，08、09 年开始回升，那时候我们没有像 90 年代末，本世纪初更大的改革措施，我们有 4 万亿政策，但结果是先导致房价上升，再导致产能过剩。

接下来我们的挑战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使得我们对于改革开放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还是要寻找两大政策，一个是提高效率，另一类是促进增长。提高效率的政策大家都讲得很多，比如说要素价格的市场化，降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财税改革，同时劲敌政府部门的活动。要实现两个倍增，我们可能还需要收入分配的改革，使得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能够快于，至少和 GDP 增长的速度相符合。

另外一类政策，有点类似于 98 年房改的政策，如何寻找一些新的经济增长亮点，这里面有很多方面是可以探索的，比如说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率，尽管人口已经老化，但是和日本相比，我们的城镇化率还低很多，所以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注重提高城镇化率的质量，有户籍的占 35%，但是居住在城市的居民超过 50%，我们当然要把 50% 更高推到 60%，70%，但是怎么把 35% 做实，做成 50%，所以需要社会福利的改革。

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就是落后地区还是非常的落后，沿海地区已经相当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所以就显现出在区域间平衡发展方面有很多文章可以做，促进低收入地区更高速增长。

另外就是发展服务业，未来解决就业的最大行业就是服务业，过去我们依赖于出口来拉动就业，当我们 GDP 排全球十几的时候，靠我们的廉价劳动力；当我们现在已经第二名，有可能是 GDP 更高水平的时候，我觉得中国出口就很难再增长了，除非月球上的人会买我们的东西。将来我们必须要靠其他的行业，尤其是服务业来带动我们的发展，我们服务业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中国服务业只占 20% 不到，美国是 70% 多。这就为我们未来的增长空间提供了一个新的亮点。谢谢大家。

何刚：感谢哈博士。我们五位嘉宾的独立阐述已经结束了，其实大家可以听到他们有很多的共识，哈博士的发言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经济增长 7.5% 不是问题，但是他强调下一轮改革红利要尽早推动和实现，尤其城镇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持续的动能。

接下来我有几个问题请教几位嘉宾。陈院长，刚才对今年中国经济进行分析的时候，这一轮更多不是靠政策的刺激，而是逐渐转向靠市场的消化和推动。我的问题是，接下来如果我们看明年，是不是可以预期，不会有大的新的，类似于此前大家期待的重大刺激政策出现？明年政策的调整，可能重点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从发改委的角度给我们提前做一个预期？

陈东琪：我代表我自己，代表不了发改委。明年的政策进一步偏松，但是有限制。偏松的理由是明年有几个条件具备，一个是 CPI，PPI，我个人预计明年上半年依然是低位徘徊，

目前的CPI最近4个月是2以下，11、12月份可能会略有上升一点，不会上很多，明年还会是在这样一个低位。PPI虽然有一年负减少，但是还是负的。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需求，订单的增加个存货之间的对冲还是需求不够。这样就给我们货币政策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有这个条件，因为我们的货币政策本质来说还是要稳定币制，但是它对稳定经济要做出贡献，但是要的是稳定币制。如果我们适当地让货币政策向上弹一弹是可以的，这是一个。

第二点，我感觉虽然今年我们前10个月的城镇就业增加了1600万，但是我想今后3个月和明年就业压力会比较大，每个月增加100万来讲是城镇，不是全国的，农村是在减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适当地创造工作岗位的政策引导，具体产业，服务业，制造业，其他领域。所以从这个必要性来讲，适当松一点是必要的。

第三，目前欧美日的政策是零利率，中国相对来讲高一些，这对我们的金融成本，以及我们的资金效益还是有影响。政策不是一定要跟欧美日接轨，是收敛，但是这么大的差来讲，对我们还是有影响。

这三个方面，促使明年的货币政策可以适当地弹性一点，但是有限，这个政策还是不能像09年那样，而且情况也不是那样。我们不仅要保证明年的经济增长7.5%、8%左右，而且不要给以后几年带来通胀的后遗症，这是我们30多年宏观调控的经济教训，这次应该会比较好的吸收。

财政政策变量比较长，这一年做多少，怎么做，要考虑今后5年，10年，乃至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的调整，它的立足点，我个人想法在经济回升力度不是很强，动力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治病的药还是要给它吃透，货币政策也是这样，不能经济没有走稳，甚至七上八下的情况下，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以持续的话，一旦下来怎么办？这种情况我认为货币政策也好，财政政策也好，今年下半年开始的微调，向上弹性的量程明年还要继续。

当然要防范对体制，对价格带来的负面影响。我的基本想法就是四个字，保持弹性，向上微调。谢谢。

何刚：谢谢。陈院长的预期比较明确，适当地继续放松，保持弹性，但是强调适度，不要对制度产生反作用。其他的几位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曹远征：今年做宏观经济，今年有两个超过预期，一个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下滑7个月超过预期，按理说应该在一季度结束，很多指标也支持这一点，但都没有做到。比如说一季度以后环比应该上升，但是同比还是在下降，可能这个背后不仅仅是宏观波动的问题，可能有调整的因素。

第二，就业也发生很奇怪的变动。我们现在正在观察，目前就业出现很大的困难，可能要看看在明年春节后，是不是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工作找不到农民工，这可能是一个政策的

考验。如果真是那时候是工作找不到农民工，还需要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出现变化，可能货币政策需要有一定的放松。

我们认为下调准备金率不是货币政策放松型，这几年中国货币的传导机制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我们是一个出口导向外汇占款的主要来源，现在是外汇占款是在持续下降，这是对冲的，但并不是货币政策的转向。可能在明年春节是考验政策的一个关键点。

何刚：曹老师谈到对政策调整是持一个更审慎的态度。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判断，对于数字的判断，我们要问一下姚先生，今年双稳，物价是稳定的，最近的通胀水平是最好的一年，明年货币政策和通胀水平有非常直接的关联，明年物价水平、通胀走势会怎么样？

姚景源：刚才陈东琪讲货币政策我也是赞成，我主张明年我们还是继续保持稳健。但是我有一点担忧，现在大家对货币政策期待值过高，我们看各个地方政府都大搞投资，动不动几千亿，甚至上万亿这么干。我是讲我们明年的货币政策空间有限。

我们这十年，我们广义货币数量我们增长 6 倍，国内生产总值才增长 1.5 倍，但是货币发行 6 倍，我们从 1949 年到现在，我们建国 63 年，到去年 62 年我们发放人民币贷款 55 万亿人民币，其中 2008 到 11 这四年就 28 万亿，一半。

我觉得我们今年的物价形式控制在 4% 以内，我们有很多原因，第一，欧债危机，世界经济不景气，国际市场上对我们的冲击减弱，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们农业我们总量丰收，过去是没有的。我们都是五年一个周期，两年丰产，两年平产，一年欠产，现在我们连续 9 年丰收。当然你说到根本上，为什么粮食丰产？不是讲 9 个字，人努力，政策好，天帮忙，天帮忙那个因素很重要，这 9 年来中国没有出现大的自然灾害，但是你能保证明年，后年天还这么帮忙吗？

所以我觉得如果讲通胀的风险，一方面看货币发行量，看流动性，另外一方面看我们的稳物价的基础，我觉得都是不牢固，都有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对物价的问题上，我主张还是要放松。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政策更多的不要放在货币政策里，更多还是放在财政政策里。比如我们企业，我们企业经营困难，我觉得最简单的解决企业办法就是减税，特别是中小企业，要解决他融资难，贷款难的问题，短时间是不可能解决的，阻力多大啊。快的就是减税，减税立刻见效，扩大消费也是这样，提高个人起征点。我主张明年我们应该更多地研究财政政策，更多地让财政政策能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

何刚：谢谢。姚先生提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看法，第一，他认为货币政策不要有过多的指望，第二，对于财政政策，尤其是大家比较期待的，结构性的减税，提出了明确的主张，通过减税来带动企业，包括个人收入的增长。

乔虹，你提到的中年政策有很多滞后，有一些该出来的政策没有及时出来，对于明年，你觉得什么样的政策，是不是减税，还是货币政策的适度弹性的放松，明年政策的预期是什么？

乔虹：对于明年的政策预期有高有低，对于短期的逆周期性的政策刺激来说，市场只能代表大部分看到的这些机构投资人，市场平均预期相对来说比较低，无论国外的投资人，还是最近做国内 A 股的投资人，对于在短期之内看到，无论是货币政策有一个明显的放松，比如说降息，降准，而且他们也扭转在过去 4 到 6 个月之内的原有的想法，为什么会降，为什么不可以做多一点，现在变得也许没有必要真的做多一些。

另外一方面从财政政策来讲，对于明年的预期，大家基本守住一个底限就是“营改增”，从市场来看，现在的预期都是比较低的。从短期来看，我们觉得陈总和姚总所说的这些事情，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将会为资本市场带来比较强烈的乐观情绪，现在短期来看，应该还是存在。

从未来两个星期之内，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可能对长期的结构调整，能够有更多的表述，大家可以更好地理解如何促进内需，推动城镇化。

何刚：哈博士，你谈到短期红利，我更关心的是长期结构调整里面，比如说您强调城镇化，强调服务业，其实你更希望强调服务拉动。在未来的增长动能这块您怎么看？

哈继铭：我们还是把问题分成两个方面来看，我们刚才在座的回答的这些问题，还是明年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我先谈一下货币政策，明年降息降准的可能性都应该是比较小的，因为我们如果说是把利率降下来的话，可能会担忧房地产价格大幅上升，因为我们调控房地产的政策，应该说有效工具并不多，如果一旦利率下来以后，我们可能货币政策对于宏观经济推动的目标，和房地产的抑制的目标有背离。

中国货币政策实际上就像停泊在岸边的一艘小船，他是钉在岸边的，在受到外币冲击的时候，只有铸起一道坝。什么时候可以拆除这个坝呢，要具备两个条件，或者两个条件当中之一，第一，就是外部的潮水退潮，第二我们的小船变得更能自由活动。我们要使得我们的利率和汇率更加市场化，这是我们自身能够做的。另外至于潮水什么时候退，那可能不是我们自己掌握的。

我们谈一下财政政策，中国需要减税，营改增对于服务业是最有利的，因为服务业减税的幅度是最大的，这也是中国发展服务业与财政政策的方向是非常一致的。

但是总体税收的下降，我觉得我们还要加以进一步的分析。减税的一个前提就是要减开支，如果开支减不下来，只减税的话，那么财政赤字会扩大，国家的债务负担会越来越重，从而进一步挤出私人部门的发展空间。

如何降低财政支出，这是一个短期内很难找出一个明确答案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需要观察一个现象，才能让自己相信财政支出能够减下来。我发现国外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大多数都去私人部门工作，或者当律师，当医生，搞科技，搞金融，中国大学生毕业到政府部门当公务员，这个现象不改变的话，恐怕财政支出是很难减下来的。我就讲这些。

何刚：关于财政政策，尤其税收这块，大家提到的对这块的期待比较多，但是这个恰恰跟我们政府部门的开支持续的上升，赤字财政有直接的关系。对于财政政策，尤其税收这块，您有什么补充和预期？

陈东琪：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税收应该减少。因为政府的权利通常就是体现在税收上，经济改革方向很重要的就是经济民主，最重要的就是税收民主，税收民主是能够足够地运作成本和运作生产过程。目前的情况，整体相对于经济发展，相对于经济增长来讲是太快了，我自己认为结构性减税是我们的一条红线，本身这也是可以和改革结合起来的。至于怎么弄，小打小闹也是可以做，治标的办法也可以做，小微企业的税，中小企业的税，降税率，总体税率下降。

但是从长远来讲，中国还是税制问题，不仅是中央和地方之间“权责不对称”的税制结构要调整，更重要是“政府拿走的”和“企业留下来的”税制关系，当然还包括劳动者所得，我们明年如果说“营改增”也好，最后和今后长期中国社会主义的目标结合起来，考虑 5 年，考虑 10 年，赋予 03 年减什么税，怎么改。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我认为今后的改革四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税收，怎么改，这是税务部门来调，应该是由第三方来决定你收税怎么收，我的想法是税率的改革。当然民间可以调，可以适当地在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做一些事情，具体怎么做当然这是税务部门。我的想法是，中国要把微观经济搞得有创新，有效率，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比较轻松的话，一定要调税收，应该是税制的制的问题，只要新一届政府这个十年，我想这是最大的课题。

何刚：我相信这也是大家特别期待的。姚先生，您提到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需要推动五个方面的改革，深层次的改革，这个改革是指什么？在明年新一届政府执政之后，可能会马上着手推进的一些，跟我们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有关的改革是什么？

姚景源：我更多讲应该关注财政政策，中国经济最深层次的问题是结构问题，货币政策对结构问题解决的作用有限，所以还要靠财政政策。

刚才乔虹讲得很对，我们过去 30 多年，我们中国经济发展是建立在两个红利上，一个是人口红利，一个改革红利，现在我们看人口红利极具减少，改革红利怎么增大？

你要减税，减税的前提是减少政府开支，你再往下推，怎么能够减少政府开支呢？转变政府职能，就是把政府干的，过去邓小平同志早就批评过的，管了那么多管不好，管不了的

事，把它交给市场，开支不就减少了。实际上我们在财政政策上做大文章才能推动改革，才能推动更深层次的改革。

我们十八大讲，我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什么我们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这么多年不尽如人意，我认为就是政府过多干预，市场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是把这些我们企业能够自己干的事交给企业，市场能够调节的事交给企业，政府一定要改革自身，政府成为一个服务型政府，你开支不就减少了。

你一个县委副书记 10 来个，乡镇还有四大班子，你说你是公仆，我们家里现在穷，我们不富裕，我们少请几个保姆不行吗？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财政政策，我认为财政政策是个突破口，往下推，一环一环我们推动改革，能够进一步保持和增加我们的改革红利，我就讲这么多。

何刚：谢谢，姚先生讲到我们的心里话，通过政府职能的改变。

今年我们都认为外部环境非常糟糕，我们过去三驾马车尤其是出口几乎不能指望，但是从目前将近 11 个月下来，似乎情况也不完全是这样，请你阐述一下，外需这块，包括出口对中国经济明年是一个什么作用，甚至是负的，可能还有些意料之外的回报？

乔虹：今年我们判断至少是不到个百分点，负 0.4 左右，明年可能会更多一些。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在判断全球的对于 2013 年和 14 年的判断之中，主要观点是明年处于一个黎明期，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暗的状况，这样确定我们明年对外需大势的判断可能是未必乐观的。很难想像我们国家在短期之中，突然通过某种方式，获得特别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比如说你可以用贬值的方法，这恐怕有一个不通的目标在这里，我们现在还升值呢。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通缩，如果我们看到更多就业上的危险，更多的企业在出现裁员，可能会看到有更多的失业大军在旁边等着，工资上涨的压力就会下降，甚至你会发现工资不涨还会降，这个恐怕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在短期内这两个是不容易实现的。

只有第三条路，就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说现在是惟一一个可以使我们站在制高点的一个方式，但是这样一个方式，经济学家的学术观点来看，到现在为止很遗憾的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观点，想提高要全要素生产效率，你用什么方法可以做的，它是一个剩余的概念，我们解释不了的变量。如果是一个剩余，同时没能达到的一些共识，基本上属于，第一，看能不能用任何方式能够短期之内将我们的经济规模效益增长，规模效益是提高 GMP 的大家共识的一点，但是我们缺乏外需的支持，很难马上提高。城镇化是一个非常好的道路，但是并不是几个月之内就能完成的。

另外一个方式，GMP 的增长，就是一个把劳动力从较低的效率水平行业，提到较高的效率水平的行业，过去 30 年，我们做的都是从农业往工业转，下一个阶段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的转变已经实现了大部分，从工业到服务业的转变是不能够避免的，这样的一个转变过程中，到底是效率提高是还是降低了，取决于生产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效率的比，现在有些服务业的效率，由于没有放开，竞争性不高的行业的特质，恐怕还不如工业。

如果是这样再转的话，我们全员的效率是降低不是提高，短期之内这个我们也看不到。

最后一点就是技术的改造和技术升级，是惟一一个我们能看到的，在前面两个基础上，能够促进 GMP 提高的。

如果要是让人们的工资收入仍然以每年 10% 或者以上的速度在增长，必须要以 GMP 的增长做前提。

何刚：谢谢，乔虹谈到国际竞争力短期内迅速提高是非常困难的。

曹老师，明年稳投资是什么？是城镇化加速进程当中的基础设施，还是教育，医疗，还是其他的大的固定资产，或者是行业投资？

曹远征：我想两个意思，今年经济下滑尽管出口是直接原因，但是更核心地看到，中国的投资是出口导向，出口引领投资，由于出口下降，从而工业投资下降，导致经济下滑。

从这个意义来说，稳投资第一个概念，要转向，以内需为导向来进行稳定，否则的话波动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含义。

第二，在经济未来增长的空间，将来是消费导向，现在出口在减弱，如果这两个衔接不好会出现波动，因此也需要稳定。

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看到经济增长是在下降，要让它稳定增长，不要让它出现幅度过大，降速过快，启动结构调整。

在这个办法中间，当然最好是能吸引民间投资，吸引国外投资，但是如果还做不到的话，政策就变得非常重要。这只是叫宏观经济稳定在一定水平上，为改革创造环境。

我们这个财政制度引起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做了 14 年以后，我们大大地成功了，恰恰导致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因此财政政策改革是必要的。

在 07 年本届政府成立的时候，温总理就说，本届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财税体制改革，后来被金融危机冲淡了。明年恐怕启动这个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何刚：谢谢。稳投资其实也是一个权宜之计。最后问一下哈博士，长期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还是要回到消费的刺激增长上？还是私人部门的投资，仍然有非常巨大的提升和刺激的空间？

哈继铭：长期的增长相信还是来自于改革结构性的调整，我在这里想就刚才发言再补充一下，这样的改革，到底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可能性更大一些。

过去我刚才说了，98年的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属于破旧立新，展望未来是立新破旧，在增量上寻求增量的发展，来降低改革的阻力。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我们将来可能有更多的领域开放给私人行业来投资，尤其是服务业。

如果一下子把一些低效的生产能力，或者生产形式开破，我发现这个阻力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我们的投资增长还是会一定程度上在经济的增长当中起很大的作用。

不仅是因为出口增长速度短期还是会持平，但是我相信长期来看，出口增长速度是一定要下降的，因为我们长期GDP只能增长7%左右，按照我们倍增的目标来看，但是我们出口如果增长10%的话，那就意味着出口占GDP的不断上升，除非月球上买我们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其他的内需，投资和消费这两个方面，尤其是私人的消费，而不是政府部门来拉动经济。

像城镇化和区域间的更平衡发展，就是发展中国最落后地区，我相信这两项政策过程有利于推动投资，其结果有利于拉动消费。过程当然是你需要建更多的学校，更多的交通，基础设施，来推动城镇化，来发展落后地区。但是一旦这个目标达到之后，甚至在这个目标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消费就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农民工是住在老板给的宿舍里面，100个人可能就共享一台电视机，但是他们如果有自己的保障性住房可以住的话，我相信这100个家庭就会买100台电视机，100台洗衣机，这就是对消费有一个很大的推动。他们的孩子在城镇上学，他们的配偶也到城镇来工作，我们可能雇一个保姆的工资越来越高，常常工作热情也不是很高，这样的话我相信城镇化是和服务业的发展本身也是相辅相成的，互相联系的，我觉得未来的投资增长这个过程，如果说有利于未来最终的消费增长，这样的投资当然还是很有必要的。

何刚：非常感谢。奔着消费而去的投资，是中国未来经济非常需要的。由于时间原因，我们不能继续讨论。今天五位嘉宾给我们贡献了各自的看法，对明年中国经济总体上有一个审慎乐观的预期，同时期待着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包括深层次的经济结构调整，在明年，在新一届政府的带领之下能够逐渐展开。

主持人：感谢各位嘉宾精彩发言。

全球经济 2012 年回顾与 2013 年展望

全球经济 2012 年回顾：傲慢与偏见

2012 年全球经济，由表及里，“傲慢与偏见”构成了 2012 年经济精神的核心关键词。傲慢与偏见，均源于对经济理论的教条理解、对所谓共识的盲目笃信、对真实力量的深层不屑、对有形之手的依赖推崇、对透支增长的不留情结、对微观崛起的普遍轻视和对改变发生的内心胆怯。这种傲慢，表现为对经济周期力量的将信将疑、对双重危机影响的明显低估；这种偏见，表现为对趋势理解的路径依赖、对结构变化的认知不足。傲慢与偏见，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应对相对滞后、宏观调控反应迟钝、政策协作普遍匮乏，并最终使得 2012 年全球经济在普遍失速的下行通道中呈现出以下令人无奈的趋势特征。

实体经济的自由落体超出预期。2012 年全球经济运行质量明显劣于之前的主流预期。IMF 于去年 10 月预测全球经济将于 2012 年实现 4% 的增长，并达到 73.74 万亿美元规模，通胀率则仅为 3.66%；而今年 10 月，相关预测已调降至 3.28% 和 71.28 万亿美元，通胀预估则调升至 4%。全球经济的滞胀令人吃惊，也令人失望。同时，全球经济的自由落体，一方面说明增速放缓正在加速恶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全球宏观调控不仅未能有效阻止增速放缓，更带来风险激生、货币超发的负面影响。

新兴市场全面补跌出人意料。新兴市场于 2008~2011 年的独立增长在 2012 年发生根本逆转。据笔者测算，新世纪(9.43,0.01,0.11%)以来，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经济增速差额的均值为 4.4 个百分点，2008~2011 年，增速差距分别为 6.05、6.21、4.44 和 4.58 个百分点，但 2012 年此数值降至 3.99 个百分点，经济表现明显疲软。IMF 于 2011 年 10 月预测新兴市场将在 2012 年实现 6.08% 的增长，而 2012 年 10 月，预估数据已经下调至 5.28%。不仅如此，补跌是全局性的，在“金砖四国”中，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增速预测分别为 7.83%、4.86%、1.47% 和 3.7%，中国创新世纪以来新低，印度创 2002 年以来新低，巴西和俄罗斯创 2009 年以来新低。

风险预判大幅失准令人扼腕。一是对核心风险构成预判失准。年初及上半年，市场将全球经济风险核心定位于欧元溃败、希腊退出、通胀逆袭和谁将成为下一个希腊，而年末回首，全年核心风险唯有经济增长广泛、持续和难以遏制的失速。二是对波动性风险骤升预判失准。2012 年汇率、大宗商品价格、股指等国际金融市场变量的波动性明显超出市场预期，市场震荡和异动对消费和投资造成了预料之外的冲击。三是对区域性特有风险预判失准。市场对欧元区德、法经济基本面相对强势的骤然缩小，对日本债务风险和政治风险的大幅上升，对中国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悄然陡增，对美国大选于经济层面的双输演化，对少数新兴市场经济体恶性通胀风险的潜在上升缺乏理性预判。

尾部风险的集中爆发引人瞩目。从结构上看，2012 年全球经济先扬后抑，尾部风险分布广泛、爆发密集，第四季度甚至可能成为 2009 年第二季度次贷危机见顶消退后全球经济最难

熬的一个季度。尾部风险主要表现为美国财政悬崖的山雨欲来、欧债危机的深度恶化、新兴市场复苏的期望落空、全球经济信心的超调受损，受上述因素影响，市场恐慌情绪积聚，实体经济活跃度也随之下降。

结构失衡的逆流发人深省。在傲慢与偏见的影响下，在全球经济自由落体的作用下，2012年出现三大逆流：在经济结构上出现南北失衡加剧的逆流现象。据IMF预测，201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17%，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2012年增长率提升的国家，美国经济在危机中的影响力不降反增。国际货币体系领域出现单极影响力增强的逆流。2012年，多元化更难以推进，欧债危机不断恶化导致欧元影响力大幅下降，而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出人意料地持续下滑，崛起速度悄然下降。在金融深化领域出现虚拟与实体脱节加重的逆流。全球范围内金融机构的生存环境和盈利态势，一定程度上优于实体经济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经济虚拟化的风险悄然上升。

反全球化的暗潮涌动令人担忧。一是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据IMF预测，2012年全球贸易增速仅为3.2%，大幅低于1980年以来5.68%的年均增速，国际需求萎缩导致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壁垒纷繁林立。二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受希腊退欧热议四起、欧洲货币一体化深层受挫的示范性影响，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持续推进的阻力不断加大。三是国际经济协作成果寥寥。2012年内，无论是各种类型的双边协商还是G20等多边沟通，都缺乏振奋人心的合作案例，制度化的全球政策协作并未能达成实质性进展。四是货币战硝烟再起。受全球货币政策普遍趋向宽松的影响，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倾向悄然加大，汇率市场内的官方干预层出不穷，博弈形势日趋紧张。五是地缘政治动荡造成经济分割。受不同区域地缘政治冲突和震荡的影响，部分国家间经济往来渠道明显收窄。

总之，2012年全球经济在滞胀双方向均令人失望，2013年的全球经济又会怎样？

全球经济2013年展望：等待和希望

2013年，三个问题共同决定全球经济的趋势走向。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2013年全球经济危险何在？

危险之一是若隐若现的黑天鹅事件。2013年，依旧有一些现实存在的隐性风险可能会进一步升级、恶化、显性为黑天鹅事件。包括美国财政悬崖斡旋失败，美国经济骤然紧缩并引发市场恐慌；希腊或是德国退欧，引发欧洲货币一体化现实的倒退，进而引发退欧国恶性通胀，欧元溃败；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硬着陆，导致全球经济新增长极骤然消失；已发生的地缘政治动荡完全失控，爆发区域性战争，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深度紊乱；少数重要经济体因各种原因进入经济交往停滞的极端状态，并导致全球经济合作氛围大幅恶化；可能出现金

融监管的大幅趋严、金融环境的剧烈变化和金融风险的集中爆发，导致少数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陷入生存危机，进而引发金融抑制、流动性缺失，并再掀金融海啸。

危险之二是持续恶化的债务风险。2013年依旧是债务危机年，全球债务风险不降反升。利用IMF的大量数据计算，2013年，全球债务总规模预估值将从2012年的57.85万亿美元升至60.27万亿美元，全球整体负债率预估值将从2012年的81.16%上升至81.29%，仍处于80%的国际警戒线上。其中，发达国家债务风险进一步加大，新兴市场负债总规模预估值小幅上升，负债率小幅下降。从预估值看，2013年，全球170个有统计数据的国家，有14个负债率超100%，28个超80%，39个超70%。14个技术上破产国家的负债率均值为134.44%，较2012年上升3.21个百分点，较本世纪初上升41.69个百分点；28个过国际警戒线国家负债率的均值为111.81%，较2012年上升2.37个百分点，较本世纪初上升28.22个百分点。结合经济实力、偿债能力、政治结构和负债水平，除欧洲国家外，2013年最危险的可能成为债务危机震心的国家依次是日本、美国和新加坡。

危险之三是无就业复苏与通货膨胀的双重掣肘。2013年，全球经济恐呈现无就业复苏的状态。发达国家的问题最突出，据IMF预测，2013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有望从2012年的1.29%上升至1.54%，但可能无法带来就业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是如此。此外，受欧元区、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新一轮全球宽松货币政策的滞后影响，2013年全球通胀压力悄然加大，据IMF预测，2013年全球通胀率预估值为3.72%，超出3%的警戒线，其中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胀率预估值高达5.79%，而且IMF的预测数据很可能低估了通胀的潜在风险。真正危险的是无就业复苏和通胀两者并存。一是导致全球宏观调控左右为难、单一政策无法同时实现两者的改善，而政策搭配的使用则难以避免试错的过程；二是带来微观福利的双重损伤，进而可能引致社会动荡，并倒逼政策层作出短视抉择；三是导致市场信心大幅受挫，进而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深度调整。

危险之四是政策非连续性和保护主义的风险融合。2012年大选扎堆，2013年将是少有的政策试水年。2012年有24个重要经济体经历了领导人选举，这些经济体的人口占全球53%，GDP总和超过全球一半。领导人更替将出台一些有别于前任或上任的经济政策，全球范围内的政策连续性可能都将受到一些影响。此外，2013年也是复苏利益争夺年，据IMF预测，2013年，全球贸易增长率预估值仅为4.48%，全球外需总量增长的萎靡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保护主义继2012年之后进一步抬头。更值得强调的是，政策非连续性和保护主义两种风险将相互融合、相互强化，并可能导致全球政策协作的缺失、以邻为壑局面的恶化，以及全球经济整体利益在博弈复杂化之后的进一步受损。

决定 2013 年全球经济趋势走向的第二个问题是一些长期积极要素的效用渐增，另一些短期积极的变化可待。

效用渐增的长期积极要素包括：美国增长主引擎悄然恢复，新兴市场经济体内生增长动力不断增强，全要素生产力渐次恢复，微观经济力量悄然崛起。可能发生的短期积极变化则有：第二轮全球宽松货币政策效果明显，美国成功迈过财政悬崖，德拉吉捍卫欧元的承诺得以兑现，全球政策协作深入开展，全球创新力继续增强。

决定 2013 年全球经济的第三个问题是：未来究竟会怎样？在四重危险得以有效控制而并未全然恶化、在等待和希望的积极因素阶段性显现且并未全然落空的“基准情形”下，2013 年全球经济将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从整体增速看，2013 年是不温不火的一年。据 IMF 预测，2013 年，全球经济有望增长 3.62%(这一预测水平可能稍高了点)，略低于新千年以来 3.75% 的均值，鉴于四重危险与积极要素并存，全年出现经济衰退和强劲复苏的可能性都不大。二是从时序结构看，2013 年是先抑后扬的一年，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均有可能陷入技术性衰退，全年将是经济意义上的无春之年，下半年积极因素的显现将有望帮助全球经济增速恢复。三是从两大阵营看，2013 年是新兴反超的一年。据 IMF 预测，2013 年新兴市场整体占全球 GDP 的比重将上升至 50.813%，首超发达国家，这一标志性反超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极从旧动力向新动力的内在转变。四是从国别对比看，2013 年是差异扩大的一年。据 IMF 预测，2013 年美国、德国、法国、日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预估值分别为 2.12%、0.9%、0.1%、2.2%、8.23%、5.97%、3.95% 和 3.82%，其占全球 GDP 的比重分别为 18.59%、3.73%、2.65%、5.43%、15.68%、6.02%、2.9%、3.04%，增长态势、全球地位、个别风险的不同导致全球博弈的格局更趋复杂。五是从通胀形势看，2013 年是分化明显的一年。据 IMF 预测，2013 年发达国家的产出缺口为 2.82%，较大的产出缺口意味着其通胀上行的空间十分有限，2013 年发达国家整体通胀预估值仅为 1.63%；但与此同时，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通胀压力大部分聚集于新兴市场，2013 年新兴市场整体通胀预估值高达 5.92%。六是从危机演化看，2013 年是暗礁四伏的一年。债务风险仍是头号风险，希腊随时会出现技术性违约，西班牙、意大利等次重要国家及法国这个欧元区支柱国家受危机影响的程度日渐加深，而日本、美国和新加坡作为系统性重要国家的债务风险演化同样值得关注。七是从政策走向看，2013 年是搭配为先的一年。一方面，在宽松的大基调下，受制于财政巩固的财政政策和受制于可用空间的货币政策急需相互配合；另一方面，在新领导人政策试水的背景下，全球层面急需务实、有效、共赢的政策协作。(2012 年 12 月 04 日《金融博览》程实)

未来 15 年中国政经走向预测

未来 10 到 15 年中国的 GDP 增速会有多高？在讨论中国经济的未来时，这是人们会问的第一个问题。

我自己的答案是：这段时期的平均增速大约是 8% 或略高，其中前半段会比后半段高一些。为了证明我的答案，我想指出，过去 30 年，中国的 GDP 平均增速约 10%，即使在 2008 年至 2009 年，美国和欧洲经济大幅衰退的时候，中国经济也保持高增速，在 2011 年和 2012 年仅有小幅的下滑。以下三种因素为这种快速增长做出了贡献：

第一，中国有充裕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包括机智的企业家、勤奋高效的工人和总体来说聪明可靠的劳动力。在大约四千年前的商朝，高质量的劳动力就利用先进的技术制成了青铜器。从那时候开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造就了这样高质量的人力资本。

第二，虽然有些机制还不完善，但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较为行之有效的市场机制。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这个因素的缺乏，中国并没有这样快速的经济增长。

第三，作为后来者，中国能以高速追赶先进的国家。美国也拥有前两个因素，但由于缺乏第三个因素，所以不能快速增长。前两个因素将保持不变，第三个因素的影响将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发达而逐渐减弱，中国总体仍将保持增长。由于中国是个大国，所以第三个因素的变化会很缓慢。当沿海地区变得更富裕时，内地的广大地区仍相对贫穷，仍能为增长提供空间。这就是我预言未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增速仍将保持 8% 的原因。

考虑到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当权。和任何执政的政治领袖一样，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对维护自己的统治兴趣盎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领导人们已经尝试并将继续尝试在必要的时候控制中国人民，同时在必要的时候为人民提供他们渴求的东西。领导人会使用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包括社会福利、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比如教育的提升和民主的推进。推进民主在近几年已经成为了每年向人民代表大会汇报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主题之一。

为了完整地预言中国未来政治体系，除了对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行为进行预言之外，我还需要预言中国人民对共产党政策的反应。由于共产党的政策是多维度的，不同群体的中国人民对政策的反应也不同，因此对以上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想要预言的是哪种政策和哪部分群体的诉求。即使我们准确地预言了未来共产党会采用某些政策，我们也需要预言在中国哪些群体会支持这些政策，哪些群体不会。中国的社会稳定将取决于在未来有多少中国人民会强烈反对某些重要的政策，以及如果存在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会不会改变这些政策。

在解释了预言中国政治发展的困难之后，我可以根据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行为

的理解来提供自己的判断。在我看来，共产党的领导人将有足够智慧不强行向中国人民推行不受欢迎的政策，这是为了他们自己能继续执政，也是为了作为领导人向中国人民提供利益。因此，未来的中国将保持政治稳定。

以上论断没有考虑一个重要的条件。我在本节开始提到，中国的政治领袖最关心维护他们的政治权力。另外，或者有人说强有力的政治领袖会试图为了私利使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结果是，中国腐败蔓延，共产党的领导层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腐败的问题可能会严重到影响中国的政治稳定。到底会或者不会，我很难做出预言。

会有一个民主政府在中国发展起来吗？答案取决于如何定义民主。民主的某些形式会逐渐发展起来，因为共产党和有影响力的中国人都想要如此。但中国民主体系的性质将不同于美国民主。实际上，即使欧洲国家的民主体系也和美国体系不同。首先要注意到，这个话题对大多数居住在中国的人而言，并不像美国知识分子和住在美国、欧洲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认为的那么重要。如果民主产生，其性质将和美国现行民主形式不同，主要原因是中国有着和美国不同的文化传统。美国人看重自由，而中国人更看重社会秩序。美国人充满个人主义，而中国人更有集体意识。比起自由，中国人更看重社会和谐、法律和秩序。他们关心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包括长辈和朋友。孔子在著名的关于和谐的理想社会的论文《大同篇》中写道：社区的财富应该由每一个人分享，人们应该像照顾自己的老人和孩子一样照顾别人的老人和孩子。这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私人财产体系的理念。

在考虑采用民主时，在选择政府官员和共产党的领导人时也将采用某些选举的形式。目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由全国党代表选举产生。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全中国最有权力的七个人）由中央委员会委员选举产生。目前，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民主是通过直接选举村干部的形式实践的。在未来，直接选举可以扩展到更高级政府官员的选拔。

（编注：2012年12月27日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 邹至庄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邹至庄，美籍华人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0年提出著名的“邹氏检验”，曾向台湾及中国大陆提供经济政策咨询，八十年代实施“邹至庄留学计划”，经济学家杨小凯、李稻葵、许小年、胡祖六等人受益于此。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未来 20 年两大权力转移

关于未来的世界格局，有三件事情值得我们仔细考虑。政府在变得愈发武断自信的同时，处理问题的能力却在下降。新近获得更大赋权的公民们对于自己的政治领袖则变得愈发挑剔。

把这两个方面放在一起考察，你或许就能得出导致民族主义和冲突复燃的原因。

日前，美国级别最高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简称 NIC)发表了每四年一次的、展望二十年后世界局势的报告。这份名为《2030 年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的报告，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发布。报告本身具有极高的阅读价值，是一座汇集了经过精挑细选的案例、有预见性的分析以及战略性洞见的宝库。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总部位于华盛顿。

这份报告花了很大篇幅阐述对于美国实力走向的看法。NIC 指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即始于 1945 年的美国霸权时期，很快就将结束。你也许会说，那又如何？世界各国的实力对比变化早已不算新闻。但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美国自身开始主动承认这一点。来自华盛顿的消息称，白宫在这份报告发表前表现出了不同以往的紧张。

除了概括性的结论以外，NIC 的分析比悲观主义者所钟爱的中国崛起、美国衰落论调更加细致——这些悲观派宣称，美国很快将被中国统治。首先，报告作者以及几乎所有的严肃分析师都认为，到 2030 年美国仍将是世界强国阵营里居首位的国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美国想要使自身主张得到贯彻，要比现在更加努力。

在看过这份报告以后，读者可以根据自身立场决定是持乐观还是悲观态度。当然，未来全球至少新增 10 亿中产阶级，这一点值得庆祝。但这对于有限的自然资源将构成怎样的压力？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过上寿命更长、更加健康的生活，但整个世界则在趋于老龄化。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丰富我们的人际关系以及获取知识的途径，但也能被暴君以及恐怖主义者用作破坏性武器。页岩油气资源使我们能够维持目前的能源消费方式，气候变化则将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社会繁荣甚至整个地球的未来。

可以确信的一点是，整个世界正在以超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段时期的速度快速演变，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不愿走出现有的条条框框。凯恩斯早在人们开始谈论数字时代以前就已经看到了这一问题。他写道：“我们的惯性思维及行为模式，极其排斥那种认为未来会与现在不同的观念，受此影响，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极力抵制把这种想法付诸实践。”

对我来说，未来二十年最吸引人的故事围绕两种巨大的权力转移。第一种是众所周知的权力东移以及南移。到 2030 年，亚洲将在大多数相对实力衡量指标上，超过欧美。不过这一转移并不只是与中印有关。墨西哥、印尼、土耳其、越南、伊朗以及其他国家都有可能成为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对这一“后西方世界”，美国将愈加难以按照自己的蓝图勾画。

然而更具有冲击力的潮流是政府影响力的衰落。这一潮流已经产生有一段时间了。包括西方和其他地区在内，任何地方的政府都由于全球化而受到了削弱，它们的影响力正在让渡给跨国公司、自由资本以及跨境网络。NIC 发现了这一由政府到个人的第二种权力转移。报

告称，个人赋权是“大趋势”，认为这一变化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组织方式。在新兴国家，不断增长的财富以及廉价的通讯技术，正在将上亿迄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人们解放出来。在几乎所有地方，妇女都获得了更多教育机会，并开始更多地发表政治看法。

这种觉醒在中东起义中可见一斑，不过它远远不限于阿拉伯世界。对此只要问问中国政策制定者就可以知道——中国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对社会及政治的期望，始终令他们感到不安。

这些发展动态多数情况下是有益的。一个妇女拥有更多权利的世界，肯定要比一个国际关系完全由男性说了算的世界安全多了。在西方，数字革命应被视作民主的扩展而不是威胁。不过深受旧式政党政治及裙带政治影响的独裁者和民主国家领导人，会因为权力的丧失而感到极大的不安。那么权力的分散有何威胁呢？问题在于各国将在一个更加分裂及不可预测的国际环境下运转。世界变得越多极化，其多边化倾向就会越弱。新兴国家对国家主权非常在意。而西方政客则越来越不愿意将权力让渡给国际机构。

这其中主要的矛盾在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更难解决对本国公民构成最大威胁的种种不安定因素（不管是经济方面还是安全方面）。失去控制的移民、经济离岸化、金融不稳定、气候变化、非常规武器的扩散、跨境犯罪与恐怖主义，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依靠单个国家政府就能解决的。政府为了重新获得权力将不得不采取协调行动。然而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可能不这样做，反而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寻找替罪羊。（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菲利普·斯蒂芬斯 2012年12月17日）

● 国是论衡

2013，习李新政突破口何在

2013，后十八大的中国，进入“习李新政”时期。尽管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总体发展良好，取得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但全球金融危机也改变了中国的外部环境，不仅出口减速，而且面临巨大压力；此外，经济结构调整缓慢，高投资低消费、工业增速快于服务业、部分行业存在“国进民退”、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急需解决。

面临这些挑战，唯一出路是加快经济转型，即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转变、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由制造业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作用转变。这些转变，需要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结构调整、要素结构调整；具体改革来看，又有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西部发展、高技术与新能源以及低碳经济、国企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改善民生等等。

如此多的任务应该从哪一点下手，或者说哪一点是政策核心呢？正如李克强所说的“深化改革，千头万绪，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化繁为简，突出重点，积极寻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找准了突破口，就会事半功倍。”那末，什么是突破口呢？是打破垄断吗？是政府体系改革吗？是国企改革，鼓励民营经济吗？是城镇化吗？是要素市场开放吗？或是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吗？这些都很重要，但笔者认为，新一届领导层的经济政策应该以还富于民作为突破口。

今后，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动力必须由投资转向消费。只有政府把财富还给居民，使得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加，让居民自己主导消费，而在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出口贸易中，最稳定、最长效、最可持续的拉动力是国内居民的消费；而居民消费率上升以后，即消费需求增加后，企业则会相应加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资金也会真正往稀缺的、投资收益率高的地方跑，而不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形成良性的持久的经济增长。

而需求结构由政府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调整,也可以抑制投资冲动，解决国进民退的问题。之前，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政府代替市场主导投资，采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尽管这对于应对外需下降对经济的巨大影响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过度投资造成了国企大幅扩张产能，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不断降低。“十一五”期间，中国的投资率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 26.2%，远远高于“十五”期间 20.2%、“九五”期间 11.2%的增长水平。

城市化的核心也就是使农民转变成市民，提高劳动生产率，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割据，是收入分配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土地制度缺陷在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流转制度不健全，农民不能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而户籍制度令农民工落地难生根。同时目前的社会保障税制度又对民工保护不足。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本是为补偿经济发展过程中被削弱的保障功能，然而现在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便携性差，使大批社会保险资源沉淀下来，这不仅是对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险权益的侵犯，更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社会不公。

而且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不利于消费率的提高。2011 年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相差 3.13 倍。而据商务部的调查显示，占全国人口 10%的最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只有 0.66，10%的最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高达 0.99。而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率是远远低于低收入者的。还富于民还需要降低税负，尤其是低收入者的负担。2007 年到 2011 年，中国个人所得税平均增速为 20.8%；远高于名义 GDP 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居民税赋负担的增速高于其收入增速，即税赋负担在加重。此外，我国社会保障对低收入职工的负担是比较重的，五险一金加起来大概是工资水平的 40%左右。而另一方面，我们大量国企分红率低，大量盈余被投入

到扩大在投资上面。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中，只调出资金50亿元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支持社保等民生事业发展，数目少得可怜。如果在今后五年，国企分红率能达到20%，全部进入社保，即使国企利润与前五年持平，就会有约为1.7万亿投入到社保基金，可使低收入者免交社保，对改善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犹如雪中送炭。

李克强近期讲话明确表达了改革的方向和策略：“调整利益格局，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作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这样可以更好地凝聚共识，减少改革的阻力。”还富于民，正是在利益增量上下功夫，对经济增长，提高新政府的民意，促进转型都有积极意义。因此，笔者认为，还富于民，可以作为“习李新政”的突破口。正如习近平在11月15日同记者见面时所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沈建光）

中共高层家事披露为官员财产公开作探索

12月23日至25日，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播发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7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物特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旧照同时播发。通过新闻报道，人们得以知悉中共高层领导的重要生活经历、施政理念、工作作风、甚至家庭情况和个人业余爱好等。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指出，距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履新刚40天，高层领导即率先披露个人工作、生活、家庭信息，其中对配偶、子女等信息的集中披露属首次，更具震撼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新的突破。

系列特稿以平民视角披露了高层鲜为人知的生活工作细节，习近平干过挑煤拉粪，写过报纸短论，爱看篮球拳击，扯嗓门沿街寻找“千里马”，李克强常年坚持阅读英文原著，喜欢打破砂锅式的追问，张德江第一时间明确“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列车残骸不能埋，俞正声座车不设特殊号牌，是个多年老网民，刘云山31年前的新闻作品仍是范文，王岐山抗击非典半年瘦10公斤，张高丽农民出身奋斗成才……有媒体称报道充满人情味，耐人寻味，极大拉近了领导人与普通民众的距离。

竹立家称，此次报道披露的很多“第一手”信息，让高高在上的领导变回普通人，信息公开透明化有利于政府与民众建立真正意义密切联系，赢得民众信任，也只有这样，执政权力才能真正转化为执政权威，这也是政治文明的具体表现。

通过系列特稿，民众了解到中央政治局高层领导从政以来的工作作风。“干干净净做事”、“不求波澜壮阔，但求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虚名不可图”、“不能打我的旗号办任何事，否则别怪我六亲不认”。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张希贤认为，这些表述与新政治局履新后提出的转作风“新八条”一脉相承，可见高层将转作风实践到底的决心与意志力。

张希贤说，现在中共面临长期执政下权力的腐蚀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的腐蚀，身体力行转作风需要更大的气魄和勇气，高层做出这样的履职承诺，是以高标准治党，释放强烈改革信号，希望能够带动全党形成良好的党建风气。

通过系列特稿，人们还集中了解到高层领导人的家庭信息。张希贤认为，领导人配偶、子女的情况虽然在报道中着墨不多，但意义非同寻常，重要领导家事公开是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突破性探索。

张希贤指出，从严治党、管好领导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历来是党建重要内容。1963年周恩来就提出领导干部要过亲属关，强调“不要造就一批少爷，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共产党不培养八旗子弟”。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财产状况如何，子女到底干了什么，老百姓不清楚，媒体也不被允许披露，社会产生很多怀疑猜测，监督的不到位甚至使一些不同层级的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做出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张希贤说。

他指出，随着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民众迫切希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其中的重要内容是党员干部家庭信息公开、财产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公开自己家庭情况，有利于推动各级领导干部逐步公开家庭情况，便于全党全社会在各层面进行监督，为今后的官员财产公开作出前期探索，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知不觉中开启的下一步。

竹立家呼吁，目前中国“裸官”现象比较严重，以中央领导为标杆，推进省市县三级主要领导的个人信息、工作信息、家庭信息逐步公开化，对遏制“裸官”现象具有现实意义。（中国新闻网 [微博] 张蔚然 2012-12-26）

●他山之石

美国是如何抑制住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

“镀金时代”美国社会财富急剧积累。但这个时代恰恰也是美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的时期，政党分赃、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现象滋生蔓延，最终激起社会强烈的改革要求。

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一个所谓的“镀金时代”。这一时期，美国的工业产值迅速赶超英法德等欧洲强国，与此同时社会财富急剧积累。但这个时代恰恰也是

美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的时期，政党分赃、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现象滋生蔓延，最终激起社会强烈的改革要求。

“贪污与无法无天的风气，乃是美国风气”

1905年，有一名法国人绘制了一幅美国“腐败地图”，对美国45个州的政治状况进行了区分，结果只有6个州政治清明，13个州属于部分腐败，25个州完全腐败。还有学者专门考察了美国1815至1975年间的腐败现象，描绘了一条“腐败指数”曲线，显示美国历史上有三段腐败高发期，分别是1840年前后，1857-1861年，1868-1876年（腐败指数最高）。

与腐败浪潮相伴的是整个社会浮躁不安，追逐财富成为一切的中心。1873年，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镀金时代》，讽刺这个时代：“浮华而铜臭弥漫，奢靡的泡沫背后，只剩下一堆冰冷的金子，就连空气中都充满阴谋的味道。”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则针对当时的社会氛围写道，“人民并非纯洁无过”，“贪污与无法无天的风气，乃是美国风气”。

这一时期的腐败席卷美国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其中行政腐败最为常见，分肥制、盗窃国库、违规特许经营等比比皆是。著名参议员乔治·霍尔对那时美国官场的腐化堕落作过精彩描述：“我在政界听到政客们厚颜无耻地讲述作官的秘诀：在美国获得权力的真正方式是贿赂那些任命官员，获得官职后则利用职权实现自我野心和满足个人报复欲望”。较之中央政府的政治分肥，地方上的腐败更直接，纽约民主党组织坦慕尼协会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腐败大案 不了了之

19世纪70年代初，纽约州和纽约市的议会选举处于政治组织坦慕尼协会的控制下，它垄断的市政职位多达4万个。该协会的老板特威德担任过纽约市议员和国会议员，他通过立法，推动有利于自己的新城市宪章通过，接着控制了纽约市政工程的提案批复大权，借此大收回扣。承包纽约市政工程的商人，有时甚至需要送上65%的工程款才能拿下一个项目。特威德还曾担任纽约市长，他在主持建造纽约政府办公大楼的时候，大肆贪污，40张椅子和3张桌子就折价17.9万美元，一只寒暑表报价7500美元。

其实1861年时，特威德还一文不名，但不过10年他就集聚了2500万美元的超级财富，有人甚至认为他的不义之财多达2亿美元。特威德和坦慕尼协会被曝光后，受到很多质疑，甚至被调查、控告，但一直安然无事。因为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卡尔多佐等人，也是坦慕尼协会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上百名与特威德集团有瓜葛的罪犯，即使证据确凿，也被减刑或赦免。不仅纽约一地如此，据统计，1860-1900年，美国市政债务由200万美元猛增到14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都与城市老板及其党徒中饱私囊相关。当时的舆论这样评价：“美国的城市政府是基督教世界上最糟糕的政府——最奢侈、最腐败、最无能。”

这一时期还有一起腐败大案值得一提。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主要股东、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爱米斯于 1867 年组建了莫比利尔信用公司，并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邦政府诈骗了数千万美元。为了预防和阻止外界调查，爱米斯不惜巨资扶植代理人进入国会，同时又将若干股票以每股 100 美元优惠价卖给共和党为主的国会议员。这些股票每股一年的红利就有数百美元之多。当时的美国副总统科尔法克斯就持有大量铁路股票。

1872 年，事情终于败露，结果显示被骗取的工程款达 9400 万美元，实际工程仅使用 4400 万美元，其余全被公司高层和大小政客瓜分。由于国会由共和党控制，涉案议员又众多，这一沸沸扬扬的“莫比利尔信用丑闻”最终竟不了了之。不过，在 1876 年的总统竞选中，这一丑闻事件极大地扯了共和党人的后腿。

求官不成 谋害总统

庆幸的是，伴随着社会财富的扩张，美国的政治社会文明也在前进，反腐败进程缓慢而有成效。在这一过程中，行政系统反腐走在了前列，而这与一位不幸的美国总统、共和党人加菲尔德有关。

加菲尔德当选总统前就立志废掉政党分赃制，但在 1881 年 7 月 2 日，即入主白宫不到 4 个月，他就遭一名求官未遂者刺杀。这名凶手认为加菲尔德当选总统有他的功劳。两个多月后，加菲尔德与世长辞。

加菲尔德之死引起美国举国愤慨。“每个阶级和阶层，每天都怀着忧虑、羞辱和憎恶的心情议论这一事件”，历史学家保罗·范里普在《美国文官制度史》中写道。改革派趁机加强舆论引导。美国《民族周刊》发表社论称，“我们看到的报刊，没有不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这种犯罪是‘分赃制’的产物的”。很快，一场改革运动的高潮到来。1883 年 1 月，美国国会通过《彭德尔顿联邦文官法》，即《一项管理与改善美国文官制度的法令》，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以能力与功绩作为录用官员的依据，文官不得因为政党关系等政治原因被免职。此后，美国通过系列反腐法律，比如 1907 年的《提尔曼法案》，首次规定禁止公司和全国性银行向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提供捐款；1910 年通过《联邦反腐败行为法》，开启美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先声。

除此之外，新闻媒体对美国反腐也贡献很大。1870-1920 年间，美国独立性城市报纸的比例从 11% 上升到 62%，而腐败是新闻热点中的热点，吸引了记者们的普遍关注。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曾从密苏里城出发，沿路调查明尼阿波利斯等 6 个城市的政治状况，将政商狼狈为奸的现实发表于自己任主编的《麦克卢尔》杂志上，1904 年又汇编成书《城市的耻辱》，在美国热销。斯蒂芬斯等一批黑幕揭发者通过自己的调查和文章，让全社会意识到了腐败的严重和危害。

多方努力使美国反腐出现了积极的成果。文首所提的美国 1815 至 1975 年间的“腐败指数”曲线显示，美国在 1914 年前后曾经一度出现 0.16 的最低水平，虽然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又增至 0.274，但是之后，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大体在 0.2 的水平上，美国刹住了腐败之风。（2012 年 12 月 27 日人民网）

●悦读时光

出家、思凡、大还俗 ——朱学勤谈《旧制度与大革命》

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这些年突然出现“历史热”，2012 年更奇怪，从年初到岁尾，一本外国老书持续大热，市面上几次脱销。它说的不是那些让热血膨胀的“大秦帝国”、“大唐帝国”或“大清帝国”，而是有点让人泻火败气的“衰史”——《旧制度与大革命》，还不是一本大众畅销书，三十多年前初版，仅仅是法国史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却成为有识、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托克维尔这本书出版于 1856 年，说的是 1789 年到 1793 年的法国大革命，怎么会引起万里之外、一百五十年后我们中国人关注？现在海内外在流传某某某在读这本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书说了些什么？为什么朝野上下将视线集中于这本书？这本身就是个信号。

革命缘于三中心共振

法国是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地球上要找一个疆域如此匀称，同时具有大西洋、地中海两条海岸线，唯此一家。气候之温和，植被之好，土壤之肥沃，飞在法国上空看到的地面景观和北京周围完全不一样。我第一次往法国飞的时候，看到底下郁郁葱葱，绿得发黑，想起我插队时的中原华北，忍不住愤慨上帝不公。法国没有一寸不是好地，从南到北，我没有看到一块沙丘、盐碱地，尤其南部之美，可称福地。政治学界流传一个共识：要找一个人口与幅员适中，政府边际效力能抵达最远边界，却又不致形成庞大高压，那就是法国。但恰恰是这个国家，近代史几乎是一部内乱史，革命不断，起义成瘾，断头台疯狂起落！

举个例子，《宪法》。英国没有《宪法》，却有宪政，从 1688 年光荣革命一锤定音，到今天四百年没有革命，而且还好好地供养着一个王室。王室婚庆大典，百姓如痴如狂，争睹如潮。美国有《宪法》，也有宪政，但是这部《宪法》是 1787 年在费城制定，正文一个

字都没改过，一直沿用到今天。与时俱进者，是《宪法》后面的修正条款。法国是世界上最先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之一，1791年宪法几乎与美国宪法同时诞生，到现在《宪法》已经改动十几次，一部接一部，几乎看不出最初的样子了。不说帝制多次复辟，仅以“共和政体”论，已经有“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现在是“第五共和”。我曾经统计过，法国平均每一代人都有机会经历一次革命，每一代人都能目睹一次宪政危机。而1789年发生的那场革命，则是规模最大、时间最久、震动最强烈的一场革命，故称“大革命”。我们说到英国革命，有没有称其为“英国大革命”？说美国革命有没有说“美国大革命”？唯有法国这场“革命”，名副其实，大家公认它为“大革命”！而这场“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并不是长治久安，而是长久动荡。今天从影响力上说，法国只能算是个二等国家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但从历史来讲，它不是二等国，曾经是地地道道的一等国。

那么革命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不能不提到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路易十四大致和康熙同一个时代，在位时间都很长，都长达五六十年，王权专制达到极点，“朕即国家”。路易十四对外扩张，拓展疆土，对内扫平豪强，迁天下贵族富户三千家于凡尔赛，类似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定都咸阳，迁天下富豪于咸阳，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铁人，立咸阳道旁。凡尔赛之奢华和气派，远超过故宫。凡尔赛成为全法国的销金窟，贵族、富户、全国的财富也都集中在那里。

那么他后来对整个巴黎的影响、对整个法国的影响大致是什么呢？吸空了地方财力，一旦倾覆，全国即刻瓦解，这个局面实际上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下来的，只是到路易十六爆发。一场大革命为什么能把全法国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那么个悲剧结局？原因多多，其中有一个则从来没人提，但托克维尔在这本书里说到了：你把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首都，三中心叠加，有一个中心发生危机，立刻引起另两个中心共振。

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学潮，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师的专业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职业需求，故而将巴黎改建为适宜和平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革命青年一喊，小街两头一堵，就是现成的一个街垒，马队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

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一直到现在都这么牛，他们有一句名言，“法国嘛？法国是巴黎的郊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呈现出病态扭曲。这是信奉全能主义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后果，一个超级首都，迟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经出过了。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就是你的坟墓。

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国历史上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谓和平迁藩。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梦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国各地，走出我视野。

这样的一个结构对法国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贵夫人既有闲又有钱，能干什么？女人天生是敏感的动物，对艺术、对异端邪说，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比男人敏感。女人们就在男人留下的客厅里开沙龙，聚集、收养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挖男人的坟墓。沙龙与宫廷近在咫尺，却是后者的坟墓，却寄生在一处！没有贵妇们的沙龙，就没有启蒙运动。这是路易十四根本没想到的事情。

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 1789 年 7 月 14 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

路易十六娶的太太是奥地利公主，也就是玛丽·安东内特皇后。她酷爱文艺，像此前所有的贵夫人一样，民间各种各样的争奇斗艳的新学说、新歌剧都要引进宫内。比如法国歌剧叫《费加罗的婚礼》，描绘的是启蒙哲学最痛恨的那个封建等级观念，实际上是攻击统治阶层。

但是王后不知轻重，打开凡尔赛大门，把《费加罗的婚礼》挪到国王眼皮子底下演出，而国王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

法国社会阶层明确地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僧侣，第二等级是佩剑贵族，第三等级是商人。按现在的标准就是，第二等级是政府官员，第三等级就是民营企业家。而第三等级之下，也就是说自耕农、小手艺匠人就没有等级身份。这个制度并不像后来我们宣传的，是农奴制、万恶的压迫。早在十三世纪法国就已经明言废止农奴制。到大革命时，三分之二是自耕农，都有一块自己的土地，从中世纪大庄园、大奴隶主手中把自己先解放出来，这一进程已经走了五六百年。这就是当时法国的情况，有封建制，但并不是最黑暗、最落后的。

经济呢？那时处在繁荣的上升阶段，并不是我们过去说那种革命公式，一穷二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深。这么一个并不算最差的状况，怎么会触发这么大的革命呢？这才是托克维尔这本书要解答的问题。

一个还不算最黑暗的国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时代触发了反抗性最强的大革命，有长期原因，也有短期的导火线。长期的原因，托克维尔说，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

好坏且不论，单就革命发生机制以及与专制压迫的关系来讲，从我们的体会也能证明二百年前托克维尔讲的是对的。真压紧了，无从反抗，一松开，危机可能反而来了。我并不是说以后不能松，或者松了是坏事，一开始就不应该松，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讨厌，更令人无法忍受，或者说改掉的那部分与未改不改的那部分不匹配，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税务官是比蒸汽机危险千倍的革命家

短线触发的导火线，这个书里没讲。他也有理由不讲。因为托克维尔不是以编年叙述为己任，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历史学家的任务。他给自己规定是历史学和哲学的结合，不仅仅是叙述事情，或者不主要叙述事情，而是要深入探索已经发生的事情后面的原因。

所以关于具体的导火索，我就补充一下，也有助于大家理解。

导火索是什么？钱，税收。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来自税务部门的官员？我一直讲，税务部门是给政府收钱的部门，但同时，也可能是给政府埋炸药包的部门。触发革命的往往是税务部门。世界历史上四次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只有俄国革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混乱，给列宁创造十月革命，他的财务危机是在革命之后找上门来。其他三场革命全因为税收引起，都是因为税务部门或者说王权要加税，未经民意机关同意，或者此前根本不需要经过民意机关同意，想加就加，加成习惯了，像吸毒上

瘾一样。直到某一天，又想再加一次，觉得此前加得比这更厉害，这次再加又有什么了不起？殊不知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就是最后一次税收，而且是小小的一次税收。

法国革命的税收原因是什么？革命前两年，也就是 1787 年，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两次革命相隔两年，相关人员相互来往，“革命志士”互相支持，故称“姊妹革命”。在革命的传导链条上，前一事之结果往往就是后一事的原因。英国要加税，北美十三州才要独立。北美独立战争实际上是因税收问题引起的“内战”。

北美独立，法王路易十六幸灾乐祸。为什么？因为在美国独立前，英国跟法国打了一仗，叫“七年战争”，争夺北美北部的殖民地。法国打败，撤退到更北面，就是今天的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是加拿大的一个核心省，是说法语的一个省，前两年还要闹独立。这些法国人哪里来的？就是那次战争打败了跑到那里去的。七年战争打败，法王记着这笔账。到了 1787 年，英国人自己起内讧，13 州要独立了。法王乐观其成，就悄悄地支持北美独立。

华盛顿他们当时只是民兵，打不过国王的雇佣军，尤其是民兵没有海军。海军从哪里来？法国支持。所以北美独立战争打八年，法国前期是隐蔽介入，后期是公开宣战。对华盛顿来说，实际上这是忘恩负义的行为，因为 1765 年的时候英王的军队帮北美赶走了法国人，华盛顿是参加过那次战争的，受过英国的战争训练。一转眼，他站在法王这边，要法王出兵帮着打英国人。

前期隐蔽介入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民间军队。民间军队当时有一个我们后来也用的称呼，就叫志愿军。为什么叫做志愿军？因为他不是政府军。当时法国和英国还没有宣战，但是法国的武装力量介入了，但又没有宣战，所以这批军队就叫志愿军，武装的 NGO（全场笑）。在座各位笑得对，并不是 1950 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才叫志愿军，此前二百年就有了。独立战争后期，法王才向英国公开宣战，出动了海军。当时出动海军相当于现在出动二炮部队，非常昂贵，只有政府才养得起。那真是帮了华盛顿，帮北美打赢了这一仗。

打完这一仗，国库亏欠得厉害。当时法国的货币单位是锂。国库亏欠达到五亿锂。路易十六对这个五亿亏空的想法很简单——由贵族承担，因为此前都是贵族承担。他把贵族召集起来，贵族不干。路易十六就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实际上符合启蒙运动的要求：把贵族底下第三等级召集过来，类似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家，问他们：“你们出不出？”企业家齐声说：“不行，凭什么我们出！”正如前面说的，当改革改到一半时，剩下的一部分更为触目、更让人反感。这个三级会议路易十四时代就停止了。所谓的三级会议就是民意会议。路易十四觉得“朕即国家”，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还开什么会。到路易十六，已经停开一百五十多年。

停了这么久的三级会议，路易十六恢复了，可谓开明进步。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按法国中世纪的传统，三级会议是分厅议事。不想这次三级会议召集了以后，他们自说自话，做了个决定，要合厅议事，三个等级要合在一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咱三个等级要形成“共识”，不能被国王分而治之！国王觉得这不是造反嘛！我已经这么开明了，让你们开这个 150 多年都没有开过的会，你们还得寸进尺？

但革命就是得寸进尺。国王下令把三级会议的会议厅锁起来，不让他们开会。人都到了，会堂锁起来，这些人就在广场上干等？不可能啊。所以他们自己找了一个露天网球场，三级代表就在那里发誓，说我们一定要开会，还要给法国制定出一部宪法，用宪法来规范国王和我们之间的权力分割！

这又进了一步，不讨论税收讨论宪法。国王觉得巴黎已经失控，军官们在凡尔赛宴饮，把象征巴黎的红蓝白三色市徽扔在底下乱踩，撒酒疯说要血洗巴黎。这些话传到了巴黎，一时谣言四起。谣言是革命最大的动员者。一个社会什么时候谣言四起，就说明革命已经在收集乌云。巴黎市民争相散播谣言，说凡尔赛要血洗巴黎，与其你血洗，不如我起义。7月14日这一天起义果然发生。因为一个税收，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马克思当年曾说，蒸汽机是比布朗基可怕百倍的革命家，我补充一句，税务官是比蒸汽机可怕千倍的革命家！

“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开始，路易十六一直摇摆不定，有时同情巴黎，有时厌恶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是要制定一部宪法，君主听宪法的制约就行。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这是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能够控制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通过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权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宪法，以及重新规划法国的行政区域，把法国划为81个省等等，都是这一年做的。这一年的革命可称小革命，有建设性。

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吉伦特派执政时发生了国王叛逃案，把国王拉回来，要不要判决国王？国王一下子变得形象猥琐，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伦特派更加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则是罗伯斯庇尔——卢梭的粉丝。他们投了死刑票，而且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

如果说第一阶段仅仅是政治革命，改变巴黎的主人，或者不改变主人，在主人旁边加一个宪法，紧箍咒套住他。那么第二个阶段就开始有了社会革命，“分田分地真忙”。第三个阶段就是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执政，更上层楼。但是，要推翻吉伦特派，你总要显示出特殊的地方，所以他把自己后面这个阶段就叫做“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他还真把自己称为“文化革命”！就是说，早在毛泽东文化革命以前两百年，法国人就玩过这一把。法国的所谓文化革命，总共一年，从1793至1794年。

文化革命是最激进的阶段，政治改，社会改，最后他们认为，最难改，但最应该改的是精神结构，要铲除旧人，要塑造法兰西新人！于是这一时期产生了大规模的教育改制，诞生了与传统文化彻底切割的新文艺，即所谓“唱红”，流行法兰西小红帽，还流行改人名、改地名，如我们搞过的“张卫东”、“李卫彪”、“反帝路”、“反修路”。

薄熙来那是小打小闹，模仿“文革”，罗伯斯庇尔早在1793年的法国，就玩过这一把。但凡玩“唱红”这一手，一开始确实是意气风发，老百姓觉得从来没有活得这么意气高扬，这么慷慨激昂。但事实上，革命革到最后就与人心为敌，与每一个人为敌。

思凡、出家和还俗

“红”为何会周期性发作，一旦发作还有那么大的魅惑？

个人有短期发热，人类群体有没有短期发热？有。个体发热，精神至上，逐渐厌世，会经历一个削发为僧或为尼的极端事件——“出家”。在寺庙中待久了，春心萌动，又会“思凡”，然后再偷偷下山——“还俗”。这样一个“出家”-“思凡”-“还俗”三部曲，在人类群体生活中也会出现。大革命来的时候，人似乎都能舍弃物质生活，显得特有精神境界，每天都在追求崇高理想，那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集体出家”的社会学现象即此降临，这个“鸡犬升天”，是说一个人相信某一种乌托邦的理想，通过广场扩音器放大，整个社会都跟着他催眠，进入他指引的精神境界。人类社会似乎总是间歇性出现这种情况，法国这样，中国“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但在广场上折腾时间长了，每一个人都开始思恋“厨房里的火鸡”，从广场偷返厨房，又想回世俗生活中去，革命中的“思凡”现象开始出现。“文革”中后期出现逍遥派，女同学热衷于编打毛衣，交换编毛衣的各种线路。男同学热衷于在宿舍里装半导体收音机，交换各种半导体收音机的线路。实际上就意味着广场上的路线斗争已经被“思凡”置换，置换为女人手里的线路、男人手里的收音机线路，已经置换为世俗的追求。同时，手抄本也开始流传开来。到这时，必有某派某党意识到这个潜流，“出家”的时代结束了，“思凡”、“还俗”的时代开始了，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山间寺庙回到山下厨房正常生活，衣食住行、男欢女爱。如果他成功地发动政变，社会就会顺着他的政变改变发展方向，我称“社会大还俗”。

于是，1794年7月24日法国发生了一个从精神向世俗的转变。因为是在夏天热月发生，俗称“热月事变”。热月事变推翻了精神乌托邦，三天后，又将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然后重新组织政府。这个组织起来的政府从革命时候的疯狂，向世俗生活大规模退却，这种退却，用邓小平允诺香港的那句话来讲最形象：那就是“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正常的生活回来了！这种集体“还俗”的社会现象历史学称为“热月现象”。我们可以说，热月现象实际上不仅仅属于法国，它既是法国的，也是俄国的，更是中国的。

中国的“热月事变”什么时候开始？1976年。我们的热月事变有两件事，一上一下，相互配合，你写上半篇，我写下半篇，这样来完成。上半篇就是1976年“四五”事件，下半篇就是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件，一个汉语版的“热月事变”，把“中国的罗伯斯庇尔”张春桥、江青送进监狱，后者差一点送上断头台，中国人开始回到正常的世俗生活。

（来源：南方周末 朱学勤 2012-12-13 第一部分完，本文为作者在共识网读书会第三期上的讲演整理稿，此系首发）